

中华革命军山东反袁战争亲历记

辜 仁 发

1915 年 窃国大盗袁世凯帝制自为 山东的中华革命军树起反袁义旗。我这时刚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受孙中山先生之命参加了这一战役。兹将其经过情况就记忆所及记录于下 以供史学界参考。

—

当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向孙中山报告，说：“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两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 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吴大洲说：“至少要 1000 元。”孙说：“好吧 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 1200 元，你们就拿 1000 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说的话靠不住 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 也不怕失败。哪怕 100 件革命事业有 99 件失败 而只有一件成功 革命就可胜利。”言者语塞。我们当时在东京听人谈到这事 都被孙中山先生这种革命精神所感动。

山东中华革命军的反袁行动，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向中国积极侵

略的形势下进行的。当时，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无力东顾的机会，出兵山东，打败德国驻军，抢占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等地。袁世凯正在进行帝制，面临这种严重关头，不但不敢抵抗日本侵略，反而无耻地划定莱州、龙口和接近胶州湾一带地区为德日两军交战区域，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在该区域内驻兵。当时山东都督是靳云鹏。日本军队以战胜德军的骄横姿态进兵济南，靳云鹏是不敢开罪日本的。

孙中山的主张是 不仅要打倒袁世凯 而且要恢复 1912年的约法和 1913年的国会，但是他的这一意图，山东的中华革命军因种种关系未能执行，以致于失败。

二

1915年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有一大部分人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我也是其中之一。当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东京时，留日学生都义愤填膺，在东京锦会馆开会表示反对，一致决议誓不承认，并推举代表三人回国请愿，坚决要求取消这个亡国条约。开大会那天，正是星期日，士官学生例假外出，得有机会参加。我们参加大会的行动被士官学校当局知道了，要用违反校规的罪名（军事学校的学生不准参加集会）对我们加以处罚。我们与学校当局争辩，推代表到校长室说明校规是针对日本学生订的，不能约束我们不爱国，因此不能处罚，否则我们宁愿退学。校方坚决要罚，势成僵局。当代表向同学们宣告交涉经过时，我们正预备出操，大家激昂起来了，有几个同学将所佩腰刀从楼上甩到地下，表示抗议。区队长抓住这点，认为不爱护武器，说武器是日本天皇所授，也就是对天皇不敬，非要全体学生列队到天皇像前请罪赔礼不可。我们更不能接受，罢课罢操表示反对。校方将袁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輿及陆海军中国学生监督周春茂找来，对学生加以

压力。争执了两天 结果由两班学生各推代表一人到日皇像前行三鞠躬才算了事。

孙中山为了组织反袁武装力量 曾派夏重民、胡汉贤到美国招集了华侨敢死先锋队多人，集中到横滨进行短期训练。至 1916 年 5 月，居正、吴大洲在山东起义，这支先锋队即开到山东归居正指挥。

这年 5 月 我们士官第 11 期的学生 21 名毕业，经理学校（即军需学校）也有三名中国学生毕业。孙中山派周应时到学校动员同学们回国参加反袁工作，每人给了路费 300 元，指定了两个目的地，一是山东，一是贵州，由各人自行决定。愿到山东的有：许宝琮、辜仁发、陈鸿庆、杨澄源、张乃威、方城钺、李铁山等。愿到贵州的有：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浦、李毓华、王绳祖等。我们到山东的一批人 随同周应时先到上海 然后随同许崇智从海道到山东 受居正指挥。

中华革命党有鉴于以前的组织暴动和暗杀行动都遭失败 徒然牺牲了不少同志 因而有所转变，着重组织武装力量。居正、吴大洲在山东组织的武装力量有两部分：一是山东各县的民团，一是由尤民、夏绍虞等策动来的红胡子。这两部分的部队 所有枪械都是日本供应的。日本人还组织了一个野战医院 到山东支援革命军。

1916 年春，山东的武装力量，组织工作已有成效。居正、吴大洲、薄子明、夏绍虞、邓天已等于 5 月 4 日在胶济铁路沿线各县发动起义，占领了潍县、高密、周村 打起反袁旗帜。居正号称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 吴大洲为山东革命军的山东都督 薄子明为革命军东北军前敌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潍县。前敌总司令部设在周村。这时山东半岛已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周村以东并无北洋军。加以日军的暗中支持，所以革命军很容易地占领了各据点。这时集中起来的民团有两三千人，由辽东来的“红胡子”号称“五大团”的约有千余人。

5 月 7 日，我们到潍县见到了居正和吴大洲，许崇智被推为中华革

命军东北军副总司令。我们这一伙初出茅庐的学生，分配在总司令部军务处工作。处长是夏绍虞。我管军械并筹设修械所。这是因为日本供应的枪械多数是坏的，供应的四门山炮是日俄战争时用过的旧炮，连表尺都没有，修理后才能使用。

革命军起义后，由于在日军势力范围内，北洋军第五师不敢开到胶东来，因而革命军很顺利地占领了昌乐、益都、博山、邹平、寿光、桓台等十余县。但是革命军内部不久发生了政见分歧，居正、许崇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倒袁的目的不仅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还要恢复约法、恢复国会；军事行动不仅仅限于山东一省，而且要向东三省和福建发展。但是吴大洲、薄子明只主张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维护共和政体，而不管其他。因此，吴、薄二人脱离了中华革命军，跑到周村，分道扬镳，打起护国军的旗帜。吴自称护国军山东都督。薄自称护国军总司令。我们这批初经世面的青年人感到失望，都想走开。于是，杨澄源去了山西，许宝琮、方城钺去了安徽，张乃威去了贵州。只有我和陈鸿庆、李铁山仍留在山东工作。我是学炮兵的，奉命成立一个炮兵队，加紧组织训练 准备作战。这时居正已成为一个空头司令。

三

山东护国军有一部分约 1000 余人，于 5 月中旬到达济南附近时，“五大团”推进到了邹平以北。吴大洲、薄子明向驻在泰安的靳云鹏提出通牒，要他宣布独立反袁，否则就要进攻济南。靳云鹏鉴于日军暗中支持革命军，不便与革命军作对，怕引起中日纠纷，他自己的地位也将不保，乃采用缓兵之计，表示与护国军妥协。

当山东护国军与袁系部队对峙之时，5 月 15 日，居正以华侨敢死先锋队为骨干，组织了五六百人潜入济南，袭击将军署，牺牲了一部分

人，失败后退出。5月底，袁世凯调开靳云鹏，以张怀芝继任。护国军与靳云鹏所订妥协办法破灭了，6月4日，护国军派一部分兵力进攻济南，也失败退走。

山东护国军与中华革命军当时最感困难的是给养问题。而胶东各县在日军占领下，早已民穷财尽，无粮无饷可资征发，以致在周村一带的部队有一星期断粮。“五大团”则“自由行动”到处抢劫，军纪荡然，百姓怨声载道。

孙中山见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已继任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就首先撤销山东中华革命军，电黎、段派人收编，以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后段祺瑞派了他的亲信曲同丰到济南来点编部队，编为一师，自任师长。

居正、许崇智遵照孙中山意旨，把总司令部撤销，带着总部人员和华侨敢死先锋队由海路去上海。护国军由薄子明，“五大团”由尤民，与曲同丰接洽改编。曲阴谋将“五大团”缴械，准备将他们集合到邹平，派第五师包围强制执行。“五大团”的枪械马匹是他们自备的，不愿交出，意图抗拒。曲即将“五大团”团长赵得胜逮捕枪毙了，因而团众哗变，从蓬莱向辽东半岛溃逃，蓬莱被洗劫一空。山东护国军则接受曲同丰的改编，成为段祺瑞日后的政治资本。

吴大洲、薄子明将军队交出后，即到日本去了。尤民在“五大团”溃散后，取道津浦路南逃。曲同丰电驻徐州的张勋将尤逮捕，就地枪决。我与陈鸿庆回到上海，后转山西工作。以上就是山东反袁战争的大概。

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

宁 武

1919 年秋 我奉中山先生电召由福建到了上海。中山先生给我讲述了当前革命的新方略：“在国际上要联俄 学列宁的革命方法 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 锜 吴 佩孚。”这就是当年所称的“三角联盟”，或“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合作”，也是中山先生的一种策略。接着中山先生指示我的任务：“你是东北人 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

当天晚上，朱执信、张孟杰找我商量，才知道跟段祺瑞合作已有头绪了。与段祺瑞合作，当时是有不少人反对的。但中山先生却认为，段祺瑞反袁（世凯）称帝，不失为爱国的军人，可以和他联合；如果他跟我们革命到底更好，否则等我们有力量时再解决他。同志们也就没有话说了。关于如何和张作霖接上头的问题，我们几经研究的结果，根据确息，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开办葫芦岛海港，就决定拿这个题目作为进身

之阶，并分途进行准备工作。1920年夏，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到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我就带了华侨资本家的信息赴天津。

运用社会关系，经过不少周折，通过张景惠介绍，我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张作霖对华侨投资表示十分欢迎，坦白说出：“我要开办自己的葫芦岛海港，就是为抵制日本的大连港口，我们一定要办好这件事情。”我乘机说明，华侨投资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外面谣传直、皖两系又要动刀枪了，时局不定，华侨是不敢来的，因为他们不愿把钱往海里扔呵！又拐弯抹角扯了一阵，我开始试探说：“听说段祺瑞已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好了，合力推翻曹、吴，如果各方面能协同动作，安定大局，华侨投资就好谈了。”张作霖就直率地问道：“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儿？”我只有笼统地回答：“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张作霖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大概和幕僚计议过了，约我再去谈话，但仅含糊地表示，他已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的话，大帅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我去见孙先生，问我可不可以，我当然同意。

中山先生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了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多了。这次是孙、张初次的直接联系，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张亚东返奉复命。我则留天津静候下文。

这年秋间，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津邀我去京会谈，在顺承王府见面。张作霖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他一高兴就聊起天来了，谈到一件有趣的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他发议论说：

“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我问是谁。他笑着说：“同你一个姓——宁武。”（在辛亥革命以后，我已化名为宁孟言。）我只好撒个谎，说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话还没有谈到正题，值日官报告曹锟来了。

后来听说，曹锟一进门就嚷：“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行三）呵？”张极力否认，劝曹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于是曹拿出杨庶堪、宋大章邮寄我的两信，信里牵涉到宋文林，作为证物。张也能随机应变，就把责任完全往宋身上一推，随即给张景惠打电话，臭骂一通，命令把宋文林扣押起来。张作霖敷衍曹锟走后，通知宋文林和我去见他。我担心张要变卦，又怕宋吃亏；而宋却认为这是大帅亲自交办的事，不要紧，我才放了心。我先向张作霖说明，我们往来的信都是由日本邮局寄发的，过去没有出过岔子。并告诉张，我们知道北京宪兵司令秦华和他们有关系，常派人监视革命党，他和日本也有勾搭，可能信是他从日本邮局偷出来的。张听了大怒：“他妈的做我的司令，跟别人干活，我要办这个小子。”最后他叮嘱我们，往后行事要严密点，免得惹出麻烦。又告我，这里有些不方便，请我去奉天再谈，他也马上要回去了。从张作霖的态度看来，曹锟这一闹一迫，虽把秘密揭穿，倒帮了个忙，起了促成的作用，不然，还不知要费多少时日、口舌才能正式提出合作问题呢？当然，张、曹间的权利之争是基本的东西。

1921年2月，我到沈阳，先和杨宇霆、张学良谈了，再去会张作霖。他明白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去先联络一下。”后派定旅长李少白同我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本。

在桂林大本营，我同李少白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问了东北情况

后，着重讲述了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和开发北方港口的计划。李非常惊奇，表示五体投地的敬佩，因为他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建国计划呵！我也曾向中山先生谈及我的看法：“张作霖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但对先生很敬仰 相信先生救国有办法 合作是可望成功的。”中山先生自然更清楚，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 打开个新的局面。所以中山先生即电上海伍朝枢代表他去东北联络 同时在交我们带给张作霖的复信中 也提出联合讨直的问题。

因为香港海员罢工，我们在香港等了一个礼拜的船。我亲眼看到家家户户放花爆 庆祝罢工胜利 很高兴。可是我忽见报载张作霖派代表某某赴桂林密商 拥护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的消息 甚为惊讶 又出乱子了。到上海才知道是安福系政客造的谣 搞的鬼。我因事在天津停了一日 李少白先回奉天。

张作霖一见李少白，不容分辩就破口大骂：“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 你胆敢说 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马上又命杨宇霆发电报不承认李是代表和他所说的话。张作霖又自言自语：“南边人我们斗不了，什么合作 算了罢。”我第二天到了 得悉上述情形 知道张作霖有了误会 不能不作解释 就去看他。他余怒未消 先说了一大篇话：

“李少白这杂种 胡说 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 岂有此理！”

“现在是共和国，你们革命党明明知道总统是选出来的，不是我某某一个人说了就成啦 为什么要登报道谣言？”

“伍朝枢这个年轻人，还实在，肯说老实话。他告诉我：两广遍地是匪 孙文没有力量北伐 至少几个月内办不到。

“我和曹锟是儿女亲家。他想做大总统 出卖东三省 我就不答应！他对英国公使说 他上了台 京奉铁路的借款合同可以延长。再对日本公使说 他上了台 二十一条也可以考虑。我姓张的就不赞同。看来还

是我自己动手打姓曹的吧，胜败都不管，什么与广东合作，算啦！算啦！！”

我慢慢地跟他解说：“报上的消息完全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耍的是挑拨离间之计。李少白在桂林根本没提过什么大总统问题，这样的大事，他没向大帅请示，敢自作主张吗？”当年的官僚政客常玩这一套把戏，张作霖也不是毫无经验的，一经提醒，他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于是我又说明，伍朝枢久居上海，两广的情形他并不熟悉，现在已不是那个样子了。李少白刚从那边回来，只要问问他就明白了。孙先生还托我转达一点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后腿就行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张作霖听了颇感动，态度立刻变转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出关”要我密报中山先生。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集会于广州，选举中山先生为大总统。中山先生旋驻节桂林，准备亲率大军北伐。但是，内因粤督陈炯明与直系勾结从中阻挠，外因湘督赵恒惕不肯假道，拖到1922年3月，中山先生乃免陈炯明职，移大本营于韶关，改道北伐。5月，中山先生誓师出兵，战事进展顺利。不料陈炯明在广州叛变，8月中山先生始脱险至沪。北方，自1920年7月直皖之战，直系战胜皖系后，就形成了直奉两大势力的直接、正面的冲突，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大战。由于张景惠的驻北京的两个师，未经正式开战就被直军全部解决，奉军又节节失利，终于败退关外。

张作霖倒不气馁，也不怪中山先生。他说：“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救国大计多想办法，这班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

中山先生平安到沪后 张作霖找我去说：“宁孟言 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候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我晋见中山先生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中山先生要我婉言代为辞谢 思索了一会又问我：“你能不能给张雨亭去电报 商借一笔款子？我有了款子，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我同意回去后，见机行事。中山先生也认为妥当，并给张一封致谢的信，暗示他如筹到款，即可戡平叛乱。张作霖见到我，先问孙先生的生活情况，我老实告诉他，经济很困难。他又是那句老话：“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 10 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 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 你去发电报。”同时，就韩麟春赴杭州拉拢浙督卢永祥之便，带去赠送中山先生的 10 万元。

我把中山先生派汪精卫、路孝忱为代表的回电告知张作霖 他兴奋地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先生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汪精卫、路孝忱来了。在将军府大厅欢宴，张作霖身着大礼服出席招待，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主人客人都讲了话，真是个盛大的宴会。几度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粤军回粤军费 50 万元 由许崇智派其兄许功武来奉领去。以后 又陆续补助过几十万元 确数现在记不清了。

在这里要附带一提的 汪精卫曾带来中山先生给我的亲笔信（解放前已交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保存）。杨宇霆坚持要将这信送大帅一阅，我也同意。因为信内有“此次派精卫、孝忱来奉，已面嘱他们，关于军国大计，未得吾兄同意之前，毋许作自我活动”的话，我想让张作霖知道，心中有数，可以防止他们的私人活动。而杨宇霆因信内有“雨公所赠 3 万元 我已分给各同志矣 烦代致谢”的话 想借此惩韩麟春一下。果然，张作霖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并说：“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 不成话 赶快再补 7 万！”

许崇智率部回粤，击溃陈逆叛军，1923 年 2 月中山先生就大元帅职，继续清剿残逆。同年 10 月，曹锟贿选总统，张作霖通电反对贿选。奉张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一面积极整军，一面与冯玉祥密使往返，协议联合倒曹。1924 年 9 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直系瓦解。11 月中山先生离穗北上，并先派孙科往晤张作霖说明他对时局的主张。

在天津张园，中山先生和张作霖作了第一次的会见。张作霖曾表示：“作霖系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翌年 3 月 12 日，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就结束了“孙、张”合作的一段历史。

唐继尧回滇讨伐顾品珍亲历记

符 昭 蹇

我在云南讲武堂毕业以后 曾在云南工作多年 到 1925 年始离滇返粤。1921 年值滇省顾品珍倒唐之变 随唐继尧出亡香港 后又相随回滇讨顾。以曾亲与其役，故对唐回滇讨顾的经过，虽事隔数十年，仍存在不可磨灭的印象。兹特追述如下。

—

唐继尧 14 岁 便作了清末秀才。旋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习陆军 毕业后，归国服务于新军，年仅 27。值辛亥革命 以一个管带率四个营入黔，一跃而当贵州督军。“护国”之前，受知于滇督蔡锷，经蔡向袁世凯竭力保荐，复调云南都督。倒袁之后，仍任云南督军兼省长。护法之役，夤缘时会，兼摄了军政府总裁和军务院抚军长，并遥领川、滇、黔、湘、鄂、粤、豫、陕等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西南对唐始有“联帅”之称 唐从此即以西南实力派领袖自居。

唐生长于封建社会，染有极浓厚的封建色彩。自署为“东大陆主人”，在云南办一所大学取名“东陆大学”，他的卫队竟取名曰“饮飞

军（龙云当过多年的饮飞军大队长）倒顾之后，重掌滇省政权，更将其直属部队改名为近卫某某大队。每逢节日，唐之出入，均以军乐队为前导，以饮飞军为随护队。而军乐队竟穿着陆军大礼服，饮飞军头戴德国式的尖铜顶帽，右手持方天画戟，左挂驳壳枪，背背六五马枪。唐则戎装乘金鞍的高头骏马，参谋副官一大堆，前呼后拥，神气十足。

唐又笃信王阳明学说，满口“良能、良知、知行合一”。当他向干部和学生“训话”时，多以此为讲题，从来未尝提过一句三民主义。有一次唐和王九龄讨论国民党入党仪式时，唐说“打指模和宣誓，是对人格的绝大侮辱”。唐对中山先生不信服的程度，由此可以想见了。

二

1921年2月7日（即庚申年除夕）顾品珍借回家省亲为名，秘密率部由滇东向昆明进袭。迨顾进抵大板桥时（距昆明仅一日行程），声称要唐下野。唐虽不愿放弃其统治地位，但顾之行动，有如迅雷不及掩耳。当时拥唐部队如李友勋、胡若愚、李永和、王洁修、龙云等均在省外，远水不能救近火；昆明仅有饮飞军大队，和巫家坝、北校场的骑、炮、工、机枪等直属大队、讲武堂学生与省防军一个营。唐自审力有所不逮，乃仓皇率眷属和其弟唐继虞及督署副官长李伯勋等少数亲信人员，由昆明循滇越铁路经蒙自、河口入越南，再经东京、海防，逃往香港。

唐、顾原系士官同学，且为把弟兄，而顾一向是唐的部下，又是红透了顶的军长。唐认为顾此举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每与人谈及，则云“不扑此獠，誓不为人”。

唐继尧抵港未久，政治上已感寂寞，值广州当局邀请，曾一度前往广州。唐此行原期有所活动，当时大本营方面有副元帅、陆军部长和参

谋总长三个职位，唐希望于三者之中猎取其一。但副元帅一职，因胡汉民覬觎已久，不愿他人问津，力主不设。陆军部长又为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兼任，不允唐染指。至于参谋总长，已为李烈钧捷足先登，而唐、李又系士官同学，且彼此交谊甚笃，唐又不肯去李自代。因此唐在广州徘徊匝旬，毫无所得，乃悄然回港蛰伏，以待时会。

1921年秋夏之交，孙大元帅号召西南各省出师驱逐陆荣廷、谭浩明，同时又正在筹备北伐。此时唐之旧部在桂林方面的有朱培德、杨益谦、胡若愚，包括张汝骥在内，筹部2万余人，柳州方面有李友勋、龙云等部七八千人。朱、杨、胡、李、龙等滇军将领，均为云南讲武堂学生，且为唐一手培植的干部，唐认为这是他的政治资本，如能重新掌握这些部队，便可大有作为。唐乃多次与其旅港高级干部（如王九龄、郑开文、唐继虞、田钟谷、李秉阳、高向春、李永和、毛鸿翔、林丽山、窦家法、郭玉奎、白小松）等商讨今后的出处问题：王九龄主张回滇最力，但其中亦有一小部分人赞成北伐者。最终唐以中山先生实力有限，军费来源枯竭，军队复杂而脆弱，军令不能统一，将来饷械兵员的补充不易，目前北伐难题尚多，不如先回滇逐鹿，以云南为根据地，再徐图北伐，较为稳当。于是回滇之议，大体上业已决定。

唐回滇之议虽已初步决定，然前方将士动向如何仍有问题。唐为侦伺他们的态度和征集意见加以煽动起见，于中秋前派王九龄、高向春、毛鸿翔、林丽山四人为代表，符昭寰为随员，秘密由港赴桂活动。当王、高等行抵潯州（桂平）时，因兵燹之余，地方秩序未复，伏莽满地，杀人越货时有所闻；且交通阻梗（原来潯柳间可通浅水电轮，但已停航），商旅裹足，以致处于进退维谷之境。大家一筹莫展，乃抽鸦片以遣愁，同时研究北进之法。有主由陆路坐轿前往者，有主雇民船由柳江前进者；但王九龄云：“如无武装护送则寸步难行。”高向春继说：“我们可出重资雇地方团队护送。”王甚赞成。我素无阿芙蓉癖，仅在旁

作壁上观。因就鸦片烟上想到从前滇军人黔、入川时，曾带过此物以充饷源，默念这次滇军人桂，必携有大量鸦片，因向王等建议：“如以鸦片为饵，怂恿驻浔粤军首长派兵护送我们，前往柳州如何？”王等均称此计甚妙，乃派我往驻浔粤军第三师十二团团部，晤魏团长魏明，并花了两百元港币，购买酒肉犒劳驻军。我首先说明唐派王九龄等前往柳州慰劳滇军，刻已抵浔，唯以交通未复无法前进，请酌情协助；其次顺便谈及做鸦片生意的问题。不料魏团长乃魏师长邦平的胞叔，而魏邦平与唐又是日本士官同学，彼此交情尚厚；且他们素慕唐之威名，魏魏明乃毅然率兵一连，并拨座船亲自护送我们，很顺利地安全到达柳州。

王、高等到柳后，除将唐亲笔函件和慰劳品分送李友勋、龙云外，并和他们多次交换回滇意见。李、龙等原属极力拥唐分子，又经高、王等的煽惑怂恿，返滇之意更为坚定。柳州方面滇军拥唐回滇已无问题，我们盘桓数日，复取道雒容、永福前往桂林，继续活动。

王、高、毛、林又分头在桂林向朱培德、杨益谦、胡若愚、张汝骥等进行商谈回滇问题。朱、杨、胡、张之间意见不一，朱培德初坚持拥孙北伐；而杨益谦则模棱两可。唯他们均提出一些个人名位、经费、冬服等要求，尤以朱培德欲望较奢。经王九龄等多次煽惑、说服，并电唐请示，得唐一概允诺后，朱始勉强答应回滇。胡、张则无条件拥唐回滇，但以伤病员须作合理之处置，又经唐复电云：“该部伤病员可派符昭鸾率领往肇庆交广东后方陆军医院收容。”我乃率伤病员二三百人和胡、张等眷属 10 余人，先行返粤旋港，向唐汇报桂柳滇军将领情况。唐喜形于色，并笑而向我说：“朱益之（朱培德字）已被孙中山所麻醉，恐怕他将来的花样还多着哩！”果然后来朱又改弦更张，不独反对唐之回滇，并在滇军往柳州结集之际，竟突向杨益谦部来一个意外的袭击，将杨益谦全军廿余营尽数缴械并为己有。朱之此举，是否奉有大本营命令，我至今尚未弄清楚。但后来孙、唐之所以未能复合，及唐拒绝就副

元帅之职，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三

唐在滇、黔做官十载 连年用兵耗资尤巨。逃港以后 为时行将一年 由于政治上的活动 私人挥霍和接济其亲信干部日常生活等费为数甚多。此外由滇陆续来港投靠的旧部 越来越多 食指日繁 开支亦不少。此时唐在经济上已濒于枯窘之境，而回滇经费复不能不作未雨绸缪。除将其眷属首饰及珠宝变卖以外 东挪西凑共筹 10 余万元 唐虑尚不敷用。时值王九龄从桂事毕旋港 复劝唐印了 15 万元军用储蓄票 以弥补饷源之不足。此票分为伍元、拾元两种 后来持往柳州以西的宜山发行。当时对于前方将士士气上来说 曾起过一些刺激的作用 但亦招致军民感情之不洽 演成后来途中损兵折将之祸。

又前方将士所需冬服之事，尚未解决。唐原拟在港购制三万套备用 但后来恐运输不便 改购棉毛卫生衣 30 大箱（每箱千件）派欧杏传、卢汉章先行运至梧州待命。

唐继尧对于回滇的准备已大致就绪 乃于 1922 年春（即辛酉年冬腊月初旬）由港率其幕僚（唐继虞留港任后方联络和向滇省拥唐部队联系 秘密乘英国商船至梧州。赖粤军兵站第三分监李民雨之助 代征雇浅水电轮四艘 于是循浔江溯江西往浔州 然后折入柳江经武宣、象县向柳州进发。

在临行之前一晚，电轮上需要旗帜以壮声威，唐命我找缝衣店赶制红缎黑呢大头旗 以应急用。唯时间太促 商人未肯承办 我随即向唐复命。值王九龄在座 向唐建议云：“制旗既来不及 不妨用白竹布书红字代替。”于是命我购妥白布及红色墨水备用 由王挥毫疾书“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等字样 写妥后派人下船悬挂停妥。不料当夜落了一阵